

《二十一世紀》、楊振寧、 二十一世紀

金耀基

楊振寧先生是當世科學偉人，今年是他一百正歲，《二十一世紀》的朋友有意撰文慶壽。很少人知道，楊先生是《二十一世紀》的「催生人」。

一 《二十一世紀》的「催生人」

上世紀1989年尾，「六四」悲劇引致的憂愴氣氛仍在，而中國正遭美國及西方多國的制裁；一時間，中國似又回到1978年之前的「孤立」狀態。香港中文大學同事陳方正、金觀濤、劉青峰和我都感到，「六四」悲劇已經發生了，但197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所開啟的歷史新運會不可、不應也不會自此中斷，我們很想能做點事，並很自然地有辦一份思想性刊物的想法。方正兄立時想起請正在中大講學的楊先生參加討論，楊先生1980年代中正式獲聘為中大第一位「博文講座教授」，一年定期來中大講學三個月。楊先生參加我們的討論時是充滿熱情的。他認為辦一份有高格調的思想性刊物，對香港、對國內都是極有意義的，他也主張這份刊物應該有科技的欄目。我記憶中，當時已近古稀之年的科學家，是決定這份刊物命名為《二十一世紀》的「催生人」之一。當然，我們對中國的未來都有期待（我本人對中國的現代化在二十一世紀是有樂觀想像的）。

1990年10月27日，《二十一世紀》創刊號正式問世，楊先生發表了〈二十世紀的物理學〉一文，他以實際行動支持並定性《二十一世紀》為一高格調的知識性（也偏向學術性）刊物。《二十一世紀》出版第三年，楊先生自願成為編輯委員。楊先生先後在《二十一世紀》發表十多篇文章，可見他對這份雙月刊的認同與重視。三十二年來，楊先生對《二十一世紀》的關注從未停止，他每年來中大，總不忘談到《二十一世紀》。記得有一次他對方正和我表示，《二十一世紀》能長期維持高水準，是很難得的，但有向純學術專刊傾斜的趨勢，這會

減少讀者的興趣和它在思想上的影響力。誠然，作為一位編輯委員，楊先生對一些批判性的時論文章會表達強烈的意見，但他對責任編委審稿的獨立精神是一貫尊重的。經由《二十一世紀》的共事經驗，我對楊先生的處世為人，以及他對國家社會的情懷增多了不少認識。

二 從改革開放到中國崛起

《二十一世紀》於1990年出版，意想不到這竟是世界風雲鉅變的前夕。1991年，蘇聯的社會主義帝國轟然倒塌，冷戰因之落幕，兩極對壘的世界格局丕然一變，美國遂成為單極的全球霸權，社會主義中國因1978年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未隨蘇聯一起陪葬，但因「六四」悲劇，國家發展的步伐徘徊不前。1992年，鄧小平南巡，發出深化改革開放的強音，繼續堅持十四年前推動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1987年，趙紫陽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徹底把文化大革命時期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國家政策轉為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在「科教興國」的理念下，徹底糾正文革的反智主義，並以知識的基底開展「四個現代化」大業。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政府大量選派留學生、專業人員到美國及西方、日本等先進國度學習、考察，快速地彌補和消滅了長期的知識、特別是科技知識的滯後。

歷史地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是中國現代化最有成效的時期；應該指出，鄧小平倡導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把「中國」與「民族」放到主體性的位置上。換言之，在中國的現代化目標下，不論是西方的社會主義，抑或西方的資本主義，只要對中國有益，都可成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資源。在這三十多年間，中美的交流、合作可說是全方位的、多面向的，這對兩國都產生極為有益的作用。1980年楊先生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擔任「愛因斯坦講座教授」時，就曾創辦並主持了「中美教育交流會」，先後資助、安排六十三位中國學者（包括楊福家、陳佳洱等傑出學者）到美國進修深造，這對中國的科技教育與研究產生了很重大的影響。楊先生2003年歸根清華大學，擔任新創的高等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後，繼續不遺餘力地推動中美科技教研的合作與交流。毫無疑問，鄧小平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速度是驚人的，當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之年，中國已隱然成為「世界工廠」，記得楊先生、方正兄和我，一起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見證香港回歸大典，楊先生的心情是充滿喜悅的，他的喜悅毋寧是香港回歸到一個日益強盛的祖國。

《二十一世紀》成立第一個十年後，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國進入世界，世界也進入中國。中國在「生產革命」之後發生了「消費革命」。中國由「世界工廠」更成為「世界市場」，因此，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中扮演起日益重要的「推動機」和「穩定器」的角色。《二十一世紀》成立第二個十年，2010年，中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從人均GDP而言，則中國仍只是一中等國家的水平）。因觀濤與青峰已於2008年從《二十一世紀》退休赴台，

故2010年後楊先生每次自北京來中大，就只有方正、我與楊先生見面時，常會談到《二十一世紀》這份刊物。我們對於為這份雙月刊取名《二十一世紀》，都有一絲得意之感。誠然，我們都不能預見在二十一世紀之初期，中國已有了這麼巨大的發展，楊先生顯然對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未來是充滿希望與憧憬的。他在2007年與翁帆合著的《曙光集》的〈前言〉中說：「魯迅、王國維和陳寅恪的時代是中華民族史上一個長夜。我和聯大同學們就成長於此似無止盡的長夜中。」「幸運地，中華民族終於走完了這個長夜，看見了曙光。」^①



左起：陳方正、楊振寧、金耀基，攝於西貢海鮮酒家，2019年。（圖片由金耀基提供）

三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楊先生說「中華民族終於走完了這個長夜，看見了曙光」，反映了一個中國和平崛起的世界級故事。自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三十年以來，中國取得了震驚世界的成就。2005年，法國學者伊茲拉萊維奇 (Erik Izraelewicz) 出版了《當中國改變世界》(*Quand la Chine change le monde*) 一書，他指出中國快速發展，乃是濃縮了西方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兩百年歷程的新試驗，締造了一個超級生產規模、超級需求的新體制。2009年，雅克 (Martin Jacques) 在「中國威脅論」充斥世界輿論場之際，發表了《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一書，著名的史學大家霍布斯鮑姆 (Eric Hobsbawm) 評論說：它不僅闡述了中國的崛起，還闡述了二十一世紀將不再是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

到了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印尼等新興經濟體已快速成長，許多次級強權漸次出現，「後冷戰」時代美國主宰世界的獨霸局面已告過去。2008年，札卡瑞亞 (Fareed Zakaria) 敏銳地觀察到世界已從「單邊主義」進入到「單一多極主義」，他更以《後美國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 作為他的書名。札卡瑞亞的世界新格局的看法很受他哈佛大學的老師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文明衝突」學說影響。

中國四十年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所取得的成就，不止結束了楊先生所說「中華民族史上一個長夜」，也實現了自1842年鴉片戰爭後無數代展開的「救亡圖存」的現代化運動的目標，並且中國在一定意義上已從傳統農業文明轉型為現代工業文明。誠然，中國今天是以一個新起的現代文明

姿態展現在世界舞台的。2011年，西方著名史學家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在《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 Apps》(*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中說：「中國的工業革命是最大與最快速的工業革命」，「世界重心從西方轉移到東方」；他引用高盛 (Goldman Sachs) 的經濟學家的預估，「中國國內生產毛額將在2027年超越美國」；他更從中國發明家獲得的新專利數量及中國科學論文產出數量僅落居美國之後的事實，認為是中國崛起的表徵。弗格森說，「我們現在經歷的其實是西方五百年來支配的末期」，又說，「我們很可能親眼目睹西方過去五百年的優勢遭到逆轉，一個文明逐漸衰弱，而另一個文明崛起強盛」。他把中美關係視為「『新興的』強權對『沒落的』強權提出的挑戰」，並發出「美國應該圍堵中國，還是討好中國」之問^②。

弗格森的《文明》出版第二年，中國進入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主政時期，中國堅持走獨立自主、和平發展之路，一心以中華民族復興為念，要把中國從現代化大國打造為現代化強國，誠然，中國現代化之終極目標則是建立一個新的「現代文明」。今天，憑藉中國地位與國力，中國自自然然從「邊陲」走進世界多元的中心序位。中國與美國、歐盟、俄國或其他上升的國家，都是或將是世界文明多元中之一元。

世界已愈來愈成為一個多元文明並存的地球村。令人不安的是，近五年以來發生了多樁顛覆世界秩序的大事件：2020年爆發的新冠病毒 (COVID-19) 已變成世紀性的災難，並出現了「去全球化」的勢頭；2022年初的俄烏戰爭迄今未止，促發了歐洲權力平衡結構的解組；最近的台海危機，影響到台灣乃至亞洲的安全環境。而2017年以後中美關係的持續與系統性對抗則將決定性地影響世界在二十一世紀未來的發展。

美國在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四年與拜登 (Joe Biden) 上任總統近三年中，與中國的關係從不太壞到壞再到很壞。2010年前，中美在經濟上曾有過合作雙贏的局面，美國的決策者表示，「他們〔中國〕需要我們，我們也需要他們」，但此後摩擦分歧漸成常態。2017年特朗普出任總統，第一時間就發出「美國第一」(America First) 的強音，接着就對中國開打貿易戰，並祭出「制裁」的大棒。國務卿蓬佩奧 (Michael R. Pompeo) 更公然提出推翻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政策宣言。想不到的是拜登入主白宮後，與中國關係進一步惡化，在貿易上完全繼承上屆共和黨政府的懲罰性策略，並且在經濟、科技、教育等領域實施制裁、脫鈎與對抗；尤有甚者，美國更以保衛「民主」之名聯合歐洲北約 (NATO) 與亞洲日、澳、印等國，對中國形成圍堵。顯然，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領導層在內政上水火不容，但在仇中、抗中上卻有高度的共識。美國看來一隻腳已踏進「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再容不得中國繼續崛起，中國的崛起視同對「美國第一」的挑戰。

那麼，中美之間是否必有一戰？如果指非核戰，今日的「超限戰」已經發生；如果指核武戰爭，我想人類還沒有愚蠢到尋求相互毀滅的結果。今天美國對中國實施的「圍堵」，是美國重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蘇聯的冷戰策略。美蘇

始終未有一戰(核戰)，蘇聯不是被美國打倒的，而是在美蘇半世紀長期「冷對峙」中自己崩潰的。很清楚地，美國為了對付中國，已掀起了一場「新冷戰」。

四 中美的文明競賽

中國面對美國掀起的「新冷戰」，這當然不是我們所願見到的，但今日的中國已非 1949 年的中國，更非 1900 年的中國；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下，四十年來中國已成為一個現代化大國，並正處於一個中國「現代文明」的建構過程中。

中美兩國雖然在「戰術上」並非完全沒有減少對立、抗爭的可能，但在「戰略上」，中美的「新冷戰」將是中美兩國「鬥而不破」的「冷和平」中長期的競賽。講到底，這將是中美兩大「文明」間的競賽。中國與美國間的文明競賽，是總體性的競賽，包括經濟、金融、科技、教育、交通、軍事以及文化價值觀等各個領域。我們看到，拜登這次又以「民主」代表美國文明的價值，並以「民主」與中國劃界，視中國為「反民主」(即專制極權)的國家。是的，這是冷戰時期美國對抗蘇聯最有力的輿論武器。當然，今日的中國不是當年的蘇聯，自鄧小平倡導改革開放後，中國就已經走自己的道路，此所以中國在 1991 年沒有為蘇聯陪葬。無可疑義，民主是一個普世價值，民主是任何一個現代文明都應該擁有的價值。不過，在中美的文明競賽中，今天的美國是不是仍有資格以民主的化身自居？

周前我與楊先生通話，他思維還是那麼敏銳，真不像百歲老人。談起年來中美關係的惡化，他是有些無奈的。談到美國的情況，楊先生對於美國「過度的個人主義」很不以為然，他說美國國力已是螺旋式的下降，認為今天的美國已出現嚴重問題，並特別提到「軍工複合體」(我認為是「軍、工、國會、學界」的複合體)對美國的影響太大了。對於美國在科技上與中國的脫鉤，他表示短期中國應可應對，但長遠就會受到影響。在近二十分鐘的談話中，我可以感受到楊先生對時代的憂思。

楊先生對美國的看法，與居住美國六十年的許倬雲大兄的觀點是很接近的。倬雲大兄在《現代文明的批判》一書中指出，西方現代文明(以美國為代表)正面臨種種「困境」，已進入「秋季」，已由興盛走向衰敗，他特別認為民主政治、個人主義都已出了大毛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美國真相》(*People, Power, and Profits*)一書中更說，美國的民主已變為 1% 的美國人的民主了。我必須說，1960 年代我留學美國時，確曾身感美國民主的豐美，但六十年後的今天，美國民主本有的豐美內涵已經逐漸被稀釋、被淘空了；不誇大地說，美國已出現了「民主危機」的徵兆，今天美國最需要做的就是盡力修復民主的機制，重顯美國文明的活力；二十一世紀未來的十年到三十年，世界最關注的，將是中國與美國的文明競賽，在無數的競賽項目中，「民主競賽」必是重中之重。上面我們指出美國民主的危機，是不

是就等於中國已不戰而勝？當然不是。中美文明的競賽現在才真正開始，美國絕非完全沒有自我修復、自我糾錯的機會。而文明競賽的真正意義，決不是哪一方倒下，就是另一方勝利，重要的是看中美哪一方的文明能在民主上發展得更豐美？

再一次指出，民主（其實應指民主與法治）是普世價值，也即它非哪一國的專利品，得者亦可再失。民主所彰顯的是個體之主體性、人之權利與尊嚴，它可能是一種可以長治久安的最有生命力的政治制度（無數有民主之名、無民主之實的國家朝立夕崩，當然不算）。中國共產黨1949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顯然是以「共和民主」為建國的目標，當然是包含了「民主」的理想。但人皆知，中國建國以來，自始即摒棄西方資產階級所主張的民主、自由（馬克思視西方的言論、結社等自由為「形式的自由」），實行的是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黨專政」，或毛澤東思想的「人民專政」、「人民民主」。從中共認知的立場看，不論是「黨專政」或「人民民主」，都是比西方民主制度更能造福中國與中國人民的。在這裏我們必須從中共誕生的時代背景來解讀中共的認知底線。中共誕生於民族被壓迫、凌辱、國不成國的中國苦難時代；它所追求的目標是民族的自由解放、國家的獨立自主，這是百年來中國有識之士「救亡圖存」的共同意識。也因此，中共所重的是「集體的自由與自主」，換言之，是民族的自由（不是個體的自由），是國家的自主（不是個體的自主）。用一比喻來說，中國的「政治民主的GDP」已超額完成，但「政治民主的人均GDP」則仍然相對滯後。無疑地，中共在「救亡圖存」上已成功地完成了時代的使命。中國以百年來從未有過的輝煌走進二十一世紀。

今天中國遭遇到美國「新冷戰」的圍堵，但中國絲毫不會消滅建構現代文明的信念與決心。我希望並相信，中國在建構新文明的過程中，將會把民主（重個體的自主性與人之自由與尊嚴）納入到新文明的價值體系中。在傳統中國，印度佛教傳入中土，發揚光大，終成中國佛教，且成為中國傳統文明精神的組成部分。「德先生」（民主）繼「賽先生」（科學）進入中土，中國將會以中國的方式（制度安排）實現民主理念的內涵。假以時日，也必將成為中國新文明的重要組成。

二十一世紀肯定會見證中國從古典農業文明轉型為現代工業文明的歷史大業。我藉《二十一世紀》祝世紀老人楊振寧先生百歲大壽，並向他請教我對二十一世紀的看法。

註釋

① 楊振寧：〈前言〉，載楊振寧著，翁帆編譯：《曙光集》（北京：三聯書店，2008），頁IV-V。

② 弗格森（Niall Ferguson）著，黃煜文譯：《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Apps》（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頁394-403。